

内部资料，供领导参阅

CRPE 咨询要报

2016 年第 1 期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办

2016 年 1 月 5 日

《“十三·五”与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论点精萃

史晋川

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不可盲目出招

赵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项目承担机构

编者话

“十三·五”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要“保增长和调结构”同时运力。各地对传统产业要进行改造和提升，转变其传统增长方式；同时，要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走节能、环保和绿色增长之路。这就意味着“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要传统产业、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并重，实现“保增长、促就业、惠民生、调结构”。而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双创”，就是为了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并延长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创造条件。

围绕“十三·五”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建设目标，本期要报推出两篇成果：一篇是由史晋川教授主持的《“十三·五”与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论点精萃，思想新颖、独到，观点富于见地，为相关政策决策人士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另一篇是赵伟教授的“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不可盲目出招”，赵伟教授认为中国要看淡美国再工业化，坚持自主产业升级，推动内需并实现国内市场与中国制造的对接。

两篇成果都非常有现实针对性，有利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

《“十三·五”与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论点精萃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史晋川

时间：2015年12月11日 下午

地点：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二楼金融研究院 236 会议室

合办单位：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

主持人：史晋川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

欢迎各位来到浙江大学，参加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十三·五”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我介绍一下各位来宾：

钱陈博士，浙江省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郭占恒研究员，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原副主任；方红生教授，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朱希伟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凯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甘思德(Scottie)教授，美国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

钱陈：

我原来是在省发改委政策法规处，现在产业处工作。前两年在平湖挂职期间，李强省长在平湖做了一个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创新的试点，我具体分管这项工

作。所以今天我的发言主要是从平湖这两年工作体会的角度来讲。浙江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工业化进程是从县级开始突破，所以到目前为止，产业转型的难点还是在县级，特别是工业的转型，是非常大的问题。

首先，是土地资源很稀缺，不是没有地，它是农业发达地区，所有都是耕保地，所以涉及到工业和城市建设，土地要素稀缺性就非常紧缺。第二，是环境容量，现在整个有了总量控制，如果上工业项目，减排的压力很大。第三，能耗总量，这三个指标控制下来，县级的发展中工业下降非常厉害。

政府过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廉价把工业用地卖出去，然后投资进来，然后就业，劳动力带进来，然后工业产值增加，政府税收拿钱，劳动力进来之后，对商业和住宅的需求增加了，然后再卖商业和住宅用地，然后再买用地。这是原来的逻辑，现在转型升级之后，要把逻辑改过来，产业转型升级，有污染的不能要了，现在怎么扭过来？这几年要引进高端项目，碰到的不是土地的问题，特别是像日本和德国企业，引进他们的企业不是要地的，甚至可以租地，德国企业就是只租地，甚至不光租地，甚至员工招聘和管理都是外包的，他们就是集中做好产品，其他都不要，但是他们很看重的是高管和高层次的技术人员进来之后，主要是看中有好的环境，有比较好的教育等等。当时平湖市领导花了300万，请野春证券做了产业升级转型，他想知道怎么做才能吸引好的企业来。野春证券做了一个报告，其他不重要，但是要发展高端服务业，重点是环境打造，平湖水网比较多，围绕这个做一个景观，把国际社区等都放到这来，主要是做高端服务业的规划，这个做好了，产业就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县里的基本上没有人接受。

现在唯一的突破是搞创新，搞孵化器、搞创业园区，搞平台建设等等。我们想借用上海的资源，包括税收优惠和高管的人员待遇，可以享受上海的政策，比如孩子可以在上海读书，厂办在平湖。这几年上海工业用地在削减，一些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想往外移，我们平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做新平台。

主持人：

后面的逻辑没有变，就是头上的逻辑变了一个，原来是廉价卖地，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现在变成建各种工业园区，搭各种平台，孵化器等等，后面的逻辑一样，吸引投资、就业，然后税收。

甘思德：

我去年底离开印第安娜大学，回到了家乡华盛顿，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民间机构，一个智库。我研究的中国问题没有变，但是服务的观众变了，原来是学术界，现在是政府、企业家、跨国公司和民间组织。

我目前正在进行中国“十三·五”规划研究项目，已经进行了半年。中国明年3月份公布“十三·五”规划纲要之后，我们就要迅速地解读和消化，四月份就要写出报告。今天，我想提三个看法和一个问题，提供一些有关老外如何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息。

我们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永远达不到共识，现在大致上分三派观点：

第一派觉得中国经济已经很好了，产业转型升级正在进行过程中，2015年第三季度的统计，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6%，各个领域都有所进展，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

另一派完全相反，觉得中国负债太多，从反金融危机投入4万亿以来，中国经济的负债增长率打破了世界记录，其他有过相同经历的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不会是例外，所以不管中国政府如何看债务问题，也不管做什么，中国会有一个金融危机发生。

第三派观点觉得中国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但目前政策方面的错误很多，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像日本经济，经过很多年经济增长逐步地下来，可能会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我个人觉得，虽然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做好，有许多问题，但是我并不悲观。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同负债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反腐的冲击，反腐是对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产生了很大压力，他们就坐等着不做决策，这和负债没有关系。最近的政策不太理想，包括去年不让投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大家就把钱放到股市，所以股市有泡沫，而发生泡沫时，政府又不知道怎么办。另外，8月11日的人民币政策的调整，市场对其反应非常不理想。在8月11日下午公布的新改革只有几句话，再过几个小时纽约股票市场下跌了600个基本点。国企改革虽然公布了，但是没有真正的改革，只是走过场，变成了加强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管理。

“十三·五”规划是否会有助于推动中国的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我有点怀疑，我做了半年的研究，我觉得现在的规划建议，主要的思路是完善现状，不让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有一些初步的改革，但是主要是完善现状。没有让政府和市场区别开来，政府在各个领域还会继续干预市场经济。

在“十三·五”规划中，我觉得不太理想的政策，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公有制在中国经济的地位，这是一个问题。规划建议提到了信息产业和国产化，也提到工业4.0，这对德国很好适合，但是对中国不一定会带来任何好处。关于“一带一路”，如果我在新疆、云南、广西，“一带一路”很好，但是从浙江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对中国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作用，我很怀疑。它可能会把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输出到别的国家。

我的问题是，浙江的“十三·五”规划会怎么样？每个省的产业都有其自己的规划，当然，不能直接违背中央，但是，浙江省产业中，制造的百分比在全国最少，所以“十三·五”规划应该是最先进的。中央去年考虑把增长率的指标取消，我觉得还是需要。上海去年人大会议没有公布增长率，浙江会公布增长率吗？

浙江的公有制怎么改革？创新政策主要有哪些？负面清单会很快普及吗？

总之，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还很大，只要进行一些改革，中国还可以再过十年，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6到7，效率还是会上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的担心是中国在改革上徘徊，不知道如何发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重要功能。

主持人：

你讲了两个意思，一个是中国发展很有潜力，但是潜力必须从改革中挖掘，如果不真的改革，不真的让市场发挥作用，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顺，实行一些真的改革，比如负面清单等等，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可能不一定能够有很好的前景。但是如果真的改革，把增长的潜力挖掘出来，未来15年还有百分之6到7的年均增长潜力。第二个意思是，浙江作为一个发达区域，它的“十三·五”规划产业转型升级是很重要的。

方红生：

当前的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的判断主要问题是“两过剩和两不足”，即房地产和传统工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产能过剩，同时新兴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

对于传统工业产能过剩的策略主要有三大策略：第一，加快企业的并购重组，把这些资源更多地转嫁到供求不足的产业。第二，扩大出口，用“一带一路”的方式开辟新市场。这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来解决。第三，把产业进行转移，转移到其他的中亚和非洲的国家。

对于房地产的库存化解问题，一个是政府购买商品房转为保障房；第二是继续降低房贷率，减少购房资本，以刺激方面的需求。第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把更

多农村的人转移到城市，这个情况下，扩大房地产的需求。

第二个方面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加快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第一，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现有的市场无法满足创新需求。

第二，推进产学研结合，提高工业转化率。

第三，为创新企业提供便利的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

第四，简政放权，防腐，降低制度性教育成本。

第五，打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假冒的产品大行其道，一些创意性的产品和新产品无法在这里生成，这对创新很不利。

甘思德：

李克强在今年3月份在人大开会时很赞同电子商务。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创新，我觉得有什么可以批评的，除了假冒问题之外，阿里巴巴是很好的公司，他们都很不错，但以交易为主，不是制造，但是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互相帮忙的。有什么不好？

主持人：

我是这么看的，奥巴马的女儿问过马云：你的电子商务比美国还厉害。马云的回答是：美国的线下的市场交易制度已经很完善了，它的流通的机制，包括物流等等非常完善，所以美国的电子商务在其完善的线下交易的制度上加进了技术力量，但是那个和中国比看起来没有这么大。而中国的整个交易都很落后，等于说整个商务的交易的起点比较低，当电子商务平台一来之后就马上起来了。所以你看到的增加的部分特别大。实际上在美国传统做得好也可以做，无非是中国的传统交易做得没有这么好，于是让电子商务做了。这样看起来特别发达。

第二个原因是我自己分析的，线上线下的交易制度、政府的管制等等在美国

是一样的，而在中国是不一样的。在线下比较紧，在线上比较松。线上很多政府官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线上交易方面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制度差异的好处，所以发展得特别厉害，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郭占恒：

我围绕这个主题谈一些观点，首先“十三·五”产业升级不是凭空的，而是借助在原有的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产业转型升级不是“十三·五”才干，实际上是中国和浙江省一直干这个事。

从浙江时政来看，到90年代末，1999年左右，浙江书记过来之后，针对浙江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量的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而且这非常明确，是省委和党写入文件专门推这个事。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的发展低小散的这些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浙江经济光走量和速度是不够的，要推动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当然有很多抓手，比如新农村，现代农业，高教园区、工业园区等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之后，习近平主持浙江工作的时候也在推这个事，“八八战略”也是大转型，八个方面，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都要发展，其实这是一个大转型，具体产业转型有两个比较充分的抓手，一个是“腾笼换鸟”，把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东西都要替换出去。2007年，浙江比较系统地提了经济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里含产业转型升级，也提出了五个方面，并进行了推进。一直到这几年，转型升级的力度有增无减，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近20年来，浙江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就没有松懈过，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当前经济的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而且浙江省经济下行压力，从指标来看比江苏还要大。这里的原因主要是这几个方面：首先，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面对阶段性的转型，放风筝不能老飞高，不然就飞掉了。经济增长也一

样，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缓一缓。第二，国际市场的变化，国际市场是一个黑洞，是短缺经济。现在已经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而且是严重过剩经济了，所以市场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社会因素，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社会矛盾充分暴露，比如腐败问题，垄断问题，特权问题等等，要消除这些东西的话，社会必定要做调整，那么对经济肯定有影响。第四，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倒逼转型升级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要面对国际压力，国内要面对老百姓的压力，我们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干，比如老百姓早上起床之后，谁关心 GDP 增长，他主要是关心空气，物价是否便宜，就业是否保障，所以以后评价中国发展指标需要慢慢地向发达国家靠拢，比如就业指标和环境指标。

第三个观点，现在浙江省找到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载体，或者是抓手。转型升级方面，微观靠市场和企业，但是政府干什么？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摸索政府干什么，但是浙江省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抓手，即打组合拳，也就是说，第一以五水共治为突破口，河里有堵塞，那么就要治污水，那么大量地关闭有污染的企业等等，去年关掉了规模以上的企业 3500 家，今年 1 到 9 月份，关了 1.8 万家的小规模企业，去年影响了工业增加值 1 个百分点，今年影响 0.8 个百分点。这方面省委很清醒，夏书记讲过好几次，是真关，不是假关。所以宁可影响 0.5 个百分点，也要干这个事。

第二，“四换三名”，浙江缺地，空间换地，电商换市，腾笼换鸟，机器换人。

最近，浙江正在学发达国家做特色小镇，实际上是做转型升级。

最后，我赞同甘思德先生的话，中国的问题不少，但是潜力很大。中国改革的问题方面，急不得，要选择一个平稳可行的，一步一步往前走。跑的要快，但是步得要稳。

主持人：

关于改革问题，我插一句。对改革问题的思考我是这么看的，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很清楚的，我相信中国改革的方向会坚持，有一些改革是马上可以做起来，而且对转型升级很重要。我最近写了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议，现在大量的“僵尸”企业，该死不死，为什么不大力度地处理“僵尸”企业，因为涉及大量失业。如果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覆盖的面和覆盖的深度很好的话，“僵尸”企业就很好解决了。西方政府碰到危机了，目标是救工人，而不是救企业。所以其实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转型升级是连在一起的。

朱希伟：

最近我们刚刚做过一个研究，分析了全国“九·五”到“十二·五”的全国规划。有几个主要结论：

首先，地方选的那些支柱产业比中央的战略产业数量多；第二，各地产业规划重规模，不重效率。第三，从政策效果来看，被选中的产业，规模增速显著高于没有被选中的产业。第四，选中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没有增加，选不选中没有差别。第五，这期选中的，下一期没有选中的产业，这个产业规模增速只有短期效应，没有长期发展效应。

此外，城市化问题。城市对于工业的支撑还是太弱了一些，核心是如何把服务业发展起来，还有一些工业如何把里面的分离出来变成服务业，这是将来相对比较长的主题。城市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因为城市承载了创新。

浙江省可能两个城市最主要，一个是杭州，一个是宁波。杭州是真正地集聚一些高端要素，比如国际化，把一些国外的要素和国内的要素吸引过来，把城市的功能完善起来，然后进行创新。中国的创新慢，首先一个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这会伤害本土企业的创新。由于支持产权保护相对比较弱，使得城市的创

新回报不足，这对创新驱动是有伤害的。

宁波主要是港口包括舟山的航运发展起来。我有一个大胆的设计，在国际上，一般来讲，港口的运输基本上不断地向外推，以前接近内陆，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港口越来越跑到外面了，原因在于轮船越来越大，轮船不能再进来了，所以越来越跑到外面，也就是说，越来越需要深水港。随着集装箱运输技术的发展，轮船吨位越来越高，有可能给他们很大的机会来替代上海。主要是看国际主要航道的水深和国际航道的兼容性，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对于浙江省或者是对于宁波舟山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机会。

钱陈：

我认为，中国以前的工业化，政府才是最大的企业，中国的工业化不是靠企业，其实政府作用最大，中国的每个县级政府就是一个企业，中国 2300 家县域政府是竞争的，为什么？政府对要素有绝对的支配权，土地也好，金融也好，资产资本也好，有绝对的主导权。为什么在前面二三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功，我们确实是调动了所有的资源支持工业化，个性化需求不足，大规模的工业化产品，只要生产出来，都是有市场的。在这种市场下，对技术进一步地要求不是很迫切，只要引进技术，生产出产品，把劳动力投入下去，这样对技术要求不高，只要工厂开出来，把产品卖出去，就有利润和税收，这就很适合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那时候，中国的基层政府的运作体制，基本上完全适应了工业化的需求，政府就是最大的工业企业，每个地方政府就是工业企业，我这里的政府和你这里的政府就是竞争的，看哪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把好的工业企业引进来，引进来越多越好。招商引资绝对是政府主导的，进来的项目配合土地和资本，于是研究出来了审批制度，这个是为政府背书的，拿批文之后可以拿地，拿地之后可以贷款，所以中国的工业企业就变成了依赖政府的长不大的小孩，就

像我们教育小孩一样，为什么不把书包整理好，因为书包都是家长整理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大量僵尸企业存在，退出不了，很多原因是地方政府不让退出，地方政府才是最大的股东，资本是政府投入的，要退出，没有政府的同意不能退出。

我最大的观点是，中国工业化政府是最大的主体，政府是“老板”，目前政府的体制就是为工业企业背书的，只有审批之后才能拿地拿贷款。企业家对政府的依赖心情就像小孩对家长的依赖一样。

王志凯：

产业转型升级，包括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一直是我们国家努力的目标。早在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中，中国政府就自上而下努力推进“两个转变”，即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和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这当中包含了国家实施的经济结构战略性重组和转移，淘汰大量的传统纺织工业，发展新型工业化。而“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家又提出了发展先进制造战略，等等。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其中的原因其实是多重的，包括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等。宏观经济新常态以来，经济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这给结构调整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是我们宏观政策追求的长期目标，这一工作需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支持，我们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之中才能有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十三·五”政府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6年的首要任务是保增长，其次才是调结构。

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不可盲目出招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赵伟

美国的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一个战略，这个战略一度为国内财经界热炒，认为将对“中国制造”构成巨大威胁。但经过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提出迄今所取得的进展梳理入手，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深入分析，我们认为这个战略迄今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该战略既难以找到对中国制造产生大的负面效应的证据，也难以让人在理论上得出损害中国制造的推断。目前看来，中国不能对“美国再工业化”这个实现概率不大且对中国负面影响难以预估的战略，当作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而盲目跟进。中国的正确选择是尽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看淡美国再工业化并坚持自我为主的产业升级战略，推动内需规模扩张和需求档次提升，实现国内市场与“中国制造”的对接。

一、美国再工业之于中国制造：核心问题

后金融危机迄今国内经济界有个断续发热的话题，这便是美国再工业化对于我国产业的可能影响。占优的论点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将直接威胁中国制造业。最大的威胁是那些依赖美国企业“外包”和离岸业务生存与发展的产业和企业。有推断认为：如若美国“重返”制造业，既搞研发和知识产权，又从事制造，进而囊括整个“价值链”，则那些原本依附在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供应链上生存与发展的中国企业，将可能遭致“釜底抽薪”之殃。进而，中国的此类制造活动空间将受到挤压。

基于上述判断的对策建议不少，两类建议最引人瞩目：一类盯住投资，建议不要急着刺激消费降低投资比重，而应继续增加投资，借以营造制造业新优势。

另一类盯着产业成本。建议政府不要急着压企业给劳工涨工资，更不要急着提高社保、医保水准。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推高制造业劳动成本，进一步缩小美国和中国制造业成本差异，帮了美国再工业化的忙。

这里，核心的问题显然有两层：一层是，美国再工业化能发生吗？另一层是，即便有可能发生，将会取何种形式并达到何种程？进而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制造”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应？

二、美国再工业化：发生的几率有多大？

关于美国再工业化，美国政经界的解释很多，有说是“重构美国资源于制造活动”的一种战略，有说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一种战略设想。更多的说法是美国重返制造业。客观地来看，可以这样去理解：这是美国政府在政客与政党利益博弈中提出的一种战略设想，核心内涵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直接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围绕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美国政府迄今可谓说得多做得并不多。迄今勉强可以和这个战略扯上关系的“大动作”不过“两招半”。两招分别为“购买美货运动”和“促进制造业”。前一招系奥巴马政府 2009 年初上台伊始提出并力促的一种运动，其造势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主旨在于刺激美国出口并减少进口，借以创造就业机会。后一招催生了一部法案，即《制造业增进法案》。2009 年提出，次年经国会审议通过。法案提出将采取切实措施以增加就业、复活美国衰落的制造业。“半招”系一部流产的法案，即《职业回国法案》，主旨是借助减免税收等财政杠杆，刺激美国企业把在海外的一些制造活动搬回本土。然而该法案 2012 年已遭议会否决。重新提出审议的概率不大。

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基础因素是什么？最重要同时也为各方所渲染的因素，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具体而言，就是美国相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制造业重要要素的价格，发生了一些有利的变动。各方谈及美国再工业化条件时最

强调的要素价格有二：一为劳动力成本；二为能源价格。前者因中国劳动成本大幅度上涨和美国工资几乎未涨的相对变化，后者源自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由于发现了大量页岩天然气田并发明了有效的开采技术，美国天然气价格大跌，进而整个能源国际依赖程度都发生了大幅度下降。

然而客观地来分析，要素价格这种变动给美方营造的落差实在有限，虽然中美两国间制造业相对工资差距有所缩小，但目前依然在 7:1 以上。至于美国能源价格和能源依存度降低，则会抑制世界能源的价格，对时下高度依赖进口油气的中国，也将具利好影响。

三、美国再工业化能伤着“中国制造”吗？

退一步来看，前述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外加美国政府支持与政客煽情，或许能吸引个把产业的部分制造环节回归本土，但要促成企业外包与离岸业务的大规模回迁，则近乎不可能。再退一步来看，即便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确得以部分实施，会如有论者预料的那样，将会损害中国制造的利益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可的，不大可能但或许有可能。说得明白些，“常规情形”下不大可能，但“非常规情形”则将有可能。

先看“常规情形”。美国再工业化要真正损害到中国制造的利益，至少得打破四个方面的“常规情形”：

第一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偏好——多样性消费偏好。这种偏好直接引出的是产品差异化。怎么理解？同一种消费品，消费者不仅看重数量，而且偏好多样性。以汽车为例，一个家庭不仅需要多辆，而且还梦想着多种款式，服务于不同的出行目的。供给一边的厂商恰恰适应了消费者这种多样性偏好，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汽车。考虑到这种多样性或曰产品差异化，设若美国重返制造业是要增加汽车产量，并不妨碍中国造车。同样的例子在过往中国制造业扩张中并不鲜见，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开始大批量制造手表时，钟表王国瑞士并不怎么着急，因

为中国所造手表和瑞士手表档次各异。由于中国大量制造手表，全球普及型手表价格一落千丈，戴表的人众大增，刺激了全世界手表市场的扩张，瑞士高档手表搭了顺风车，乘机扩张了市场。

第二个是产品内分工及其所依托的价值链贸易、供应链贸易。这是最近 30 年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传统国际贸易的大宗发生在产业间和产业内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不同产业之间所产不同种类产品的交换，后者表现为同一行业内部不同档次、款式甚至品牌的同一种产品间的交易，又称产品内贸易。贸易品主要是中间产品，即为生产消费者最终消费的那种消费品而需要的投入品。一件略有些技术含量的耐用消费品，往往由成百上千零部件构成，全球制造业发展历史与现实和经济理论研究一再证明，这些零部件由分散在多个地域的众多供应商制造，每一类供应商专业化于一种零部件制造，这比集中在一个地域由一两家厂商包揽更有效率，也更能激发创新。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大势。就这个视野来看，美国再工业化不可能逆转垂直专业化分工，囊括一件复杂产品的整个供应链，也不可能逆转水平专业化分工，包揽某种产品的所有类别。

第三个是经济全球化大势。经济全球化即国与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新世纪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推动全球化的基础因素是信息技术革命，以互联网宽带网和移动通信上网为标志的通信技术革命，使信息流动成本一落千丈，信息甚至金融资产等可以光的速度流动，距离不再重要。由此催生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与服务的“外化”。两个外化不可逆转，即外包(outsourcing)和离岸(offshoring)。经济学高度简化的模型推断和实证研究证明，这两个外化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劳动力技能异质性，劳动者可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个档次；二是最终产品制造过程不同生产环节复杂程度的多样，因而附加值大小各异。美国高技能劳动占劳工比重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故而集中于高技能、高复杂度的环节，而将低技能与低复杂度的制造环节外化给东亚尤其是中国。就这个视点来看，

美国再工业化即便有些作为，也不会和中国抢夺低技能制造环节的，因为这样做企业不划算。

第四个是比较优势原理。这个原理最简洁的表述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小到一人或一家企业，大到一区或一国，参与分工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放弃那些自己不具比较优势的活动。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任何国家大而全一定失败，效率最低。美国精英们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通过再工业化回归大而全，因而封闭经济时代！

既然这些“常规情形”很难以逾越，美国再工业化损害中国制造甚至损人利己的猜想就很难成立。

当然，任何事物都可能例外，若发生例外的“非常规情形”，结果又当别论。最大的非常规情形多半来自中国内部。假如我们的产业决策者判断有误，面对美国再工业化鼓噪而盲目跟进，去出台大的应对策略，则可能招致损失。别的跟进策略略而不论，单是前述“稳缓策”（稳投资缓消费）建议，就足以自乱阵脚，加剧刚刚有些缓解迹象的内需不足和投资过度的病症，加剧产能过剩和环境灾难，并再次延宕转变生产方式方略的实施。

结论是不难得出的：美国再工业化的确是个战略，但迄今多半还停留在政府意愿和立法程序中，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做下去障碍重重。若拿这样一个目前看来实现概率不大的战略当作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盲目跟进，无异于前苏联对于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盲目跟进。可能损及中国自身稳定的战略利益！客观地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根基，在于提升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让普通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收益。中国经济的真正希望，在于充分利用已经过剩的内外储蓄，营造全球无与伦比的国内大市场。这个世界，谁握有市场谁就有能力影响国际经济格局！

CRPE 中心简介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英文名：Center for Research of Private Economy, Zhejiang University；简称：CRPE）是在国家教育部的关心和支持下，由浙江大学批准建立的我国高校首家以民营经济问题为研究重点的学术与政策研究机构。CRPE 于 2001 年开始筹建，2002 年 9 月 28 日正式成立。

CRPE 的宗旨是“扎根实践沃土，营造学术高峰”，以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案例为研究起点，把学术视角扩展到全国范围的民营经济现象；致力于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和分析工具，剖析民营企业的成长规律和经营方略；致力于组织民营经济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提升中国民营经济问题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水平；致力于发展与民营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密切联系，通过对中国民营经济前沿性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公众、企业界和政府部门提供最优质的研究成果和决策分析服务。

CRPE 自成立以来，通过机制创新整合国内外一流的研究团队，开展了活跃的学术调查、交流及研究活动，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品牌，承担了国家“十五”“211 工程”项目“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和国家“985 工程”二期项目“中国民营经济研究”，并于 2004 年成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CRPE 正日益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民营经济研究和咨询机构。

CRPE 咨询要报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自 2002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服务。CRPE 立足浙江，以浙江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民营经济实践的实践作为研究、收获的沃土；依托浙江大学经济、管理、法学和农业经济及社会科学研究团队，潜心于中国转型经济的改革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经过三年时间的发展，CRPE 已经跻身中国一流研究和咨询机构。

目前，中心建设有维护周到、信息量丰富、具有实质内容的工作网站，同时定期编辑印发 CRPE 简报，记载中心大事，介绍中心成果，观察社会热点，评点社会时事。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编印一份 CRPE 的政策咨询报告，及时将中心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以政策建议或咨询报告的形式反映出来，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和抄送省、市有关部门，提供给领导参阅，这是 CRPE 自成立始就致力开展的工作。

特别是现在即将进入“十三五”时期，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变化会更加迅猛，当然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会交织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显现，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CRPE 责无旁贷。CRPE 编印一份政策咨询报告，既及时反映中心的重大研究成果；也可以为中心的研究人员，包括其他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发表观点的平台和上传政策建议的渠道。

从 2006 年起我们不定期地编印《CRPE 咨询要报》，每期围绕一个主题，编发 1~2 篇文章，紧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现象和深层次问题，加以观察和分析，发表能够引起领导和决策部门重视并可能被其采纳的意见和建议。CRPE 竭诚希望那些关心浙江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学者、官员和各界有识之士拨冗赐稿《CRPE 咨询要报》。**来稿请用 CRPE 电子信箱，并注明投 CRPE 咨询要报。**

地址：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4 楼

邮政编码：310027

电子信箱：crpe@zju.edu.cn

电话：(086) 571 87952835

传真：(086) 571 87952835

主编：金祥荣

网址：<http://www.crpe.cn>